

非对称性同盟中的 弱国不追随行为分析

王 婧 董向荣

[摘要] 同盟是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美国与其他国家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一般而言,美国主导的同盟都可界定为非对称性同盟。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势一方通常身处不平等地位,在对外政策上多倾向于追随强国战略安排。但弱国有时也会采取程度各异的不追随行为。本文以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为核心要素建立弱国不追随行为分析框架,提出强弱国之间存在强强、强弱、弱强、弱弱四种短期相互依赖关系,并持有一致或差异的威胁认知。当强国对弱国为弱依赖、弱国对强国为强依赖时,强弱国权力差距较大,弱国不具备主动权。强弱国威胁认知一致时,双方有应对威胁的共同安全利益。上述情况下弱国一般不会出现不追随行为。而在另外三种相互依赖情形与威胁认知差异的共同影响下,强弱国权力差距缩小,弱国掌握一定主动权,双方又不存在弥合利益分歧的共同威胁,弱国可能采取消极回应、要挟加价、直接对抗甚至结束盟约等不追随行为。本文以韩国、土耳其、菲律宾、新西兰等国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对美国的不追随行为为例,探讨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产生机制。

[关键词] 相互依赖;威胁认知;非对称性同盟;不追随行为;澳新美同盟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5.06.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5)06-0064-(15)

[收稿日期] 2024-12-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GJB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项目(2023DFYSQQY01)

[作者简介] 王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07)。

一、问题的提出

同盟是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主要工具,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身为超级大国,美国与许多弱国共同构成非对称性同盟。非对称性同盟中的弱国,一般倾向于追随同盟主导国的步伐,但也不乏不追随的案例。弱国可能明知违背强国意志的后果,依然采取不同形式

的不追随行为。本文重点关注这些差异化不追随行为的产生机制。

本文讨论的不追随行为与同盟内部矛盾或制衡失败有所区别。同盟内部矛盾是对盟友间关系、状态的描述,而不追随则是互动结果的体现。与强国存在矛盾的弱国不一定采取不追随行为,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矛盾,最终向强国妥协。本文真正要讨论的是何种条件或情境下,弱国不愿忍耐退让、不追随强国。而“制衡”更多表达的是弱国为维护利益阻止强国做某事。但关于不追随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弱国对强国的不配合、拒绝支持、反抗、争取利益等行为,也包括与强国政策的疏远、模糊应对,可能并未阻止强国做某事。

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可能出现在以下情景:强国对弱国发出明显要求追随、配合或提供支持的信号;弱国有能力与强国合作而非能力不足被强国忽视;强国要求弱国追随的政策违背弱国利益;弱国对强国主导的现存安排不满,希望借机扩大本国利益等。在上述情况下弱国采取的消极回应、要挟加价、直接对抗、结束盟约等不同程度拒绝、反抗强国的行为,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不追随行为。例如,1964年,美国约翰逊政府要求英国出兵参与越南战争。英国对美国消极回应,仅提供政治支持并未出兵。^[1]2015年,美国以监视缅甸罗兴亚难民海上偷渡为由,要求泰国开放普吉机场和乌塔堡空军基地时,泰国虽未答应,但允许美国在泰国飞机护送下有限使用泰国领空。2017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需要盟友配合时,韩国文在寅政府未直接表态,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模糊姿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美国积极赞成,土耳其以北约成员国身份提出反对,借机向美国要价。^[2]①2003年美国以反恐名义发起伊拉克战争,呼吁北约盟友参战,法德直接对抗美国,拒绝派兵。^{[1][2]}2017年,土耳其与美国对抗,不顾其警告执意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1991年,美国希望保留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而菲否决延长基地协议令美撤军。1986年,新西兰坚持反核政策,拒绝美海军舰艇访问,退出澳新美同盟。本文将从相互依赖和威胁认知出发阐释弱国不追随行为产生机制。

二、既有研究回顾

学界关于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的研究,主要从追随与制衡的传统理论、同盟管理、同盟认知、利益分歧等方面展开分析。

在关于“追随”问题的传统理论探讨中,多是对不同国家结盟选择的阐释。传统理论认为“追随”意味着与强者结盟,“制衡”则是与弱者结盟共同对抗强国。但在国家采取“追随”与“制衡”行为的主要动机上存在不同说法。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从体系结构角度提出,国家为保证安全与维持体系中的地位而采取“追随”或“制衡”。^[3]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则认为一国是否“追随”由其如何应对外部威胁的挑战决定。^[4]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提出利益平衡理论,认为追随更多是受利益驱动的自愿行为。国家为捍卫价值与扩大利益付出的成本真正决定其采取“追随”还是“制衡”策略。^[5]传统理论中的“追随”或“制衡”表示弱国是否与强国结盟的状态,而已结成同盟的弱国对强国“追随”或“不

① 土耳其在2023年3月30日批准芬兰加入北约,2024年1月23日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追随”动机则有所不同。结盟理论中的“制衡”是为了捍卫本国利益，保证生存。但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动机更广泛，包括维护、扩大本国利益，甚至趁机要挟盟主。传统结盟理论不足以解释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

关于同盟管理与不追随行为，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化不足、弱国实力上升、同盟困境等内部变化可能引发弱国不追随行为。一般认为，同盟制度会约束弱国盟友，影响其战略选择，^[6]鼓励追随行为，限制和惩戒不追随行为。但当同盟制度设计对威胁或环境变化适用性不足，无法满足弱国所需时，可能引发不追随行为。^[7]有学者认为弱国实力增强会推动其追求自主性，^[8]从而改变强弱国防御成本分摊。^[9]但弱国实力上升并不必然造成对强国不追随。有时，强国可能赞成实力上升的弱国在本国塑造的国际秩序中承担更多责任，弱国反而会对强国战略紧密追随，以实现在同盟体系内的声望需求。比如，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主动出兵越南协助美国，韩国认为这是本国实力上升能够回报美国、为美韩同盟和自由世界作出积极贡献的机遇。^[10]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认为，同盟形成之后面临的主要安全困境是“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当一国担心被抛弃时，可能采取不履行承诺或威胁退出同盟等行为，迫使盟友强化同盟；当一国担心被牵连时，也会采取相应行为避免盟友将自己拖入战争，^[11]两种情况下弱国均可能产生不追随行为。有学者指出，进攻性强国与防御性弱国组合，强国担心被抛弃，弱国担心被牵连，^[12]弱国有更强离心倾向，从而不追随强国。弱国也可能主动利用同盟困境影响强国决策，如与对手缓和关系加剧强国担忧令其让步等。^[13]

关于同盟认知的既有研究认为，强弱国之间对威胁以及盟友可靠性的认知与不追随行为有一定关联。同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主要职责，强弱国威胁认知差异会导致盟友采取不同行动。^[14]沃尔特指出，当一国认为对手威胁减弱而盟友具有进攻意图时，^[15]弱国可能不会追随强国。对盟友可靠度的认知会影响一国同盟政策。国家基于盟友履约情况、过往同盟声誉等形式对盟友可靠性认知。^[16]当强国战略信誉下降，弱国对强国信任不足，^[17]或强国在面对威胁时发出不愿或无力保护弱国的信号时，^[18]弱国可能认为强国无法提供安全保障，引发不追随行为。

关于利益分歧，既有研究认为，弱国采取不追随可能是与强国利益相悖、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非对称性同盟中强弱国对彼此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从自主—安全交易的角度指出，当弱国对强国有安全诉求时，需牺牲自主性来配合强国外交政策；反之，当弱国对强国安全诉求减弱时，可能寻求自主性提升，^[19]不按强国意愿行事。该模型将自主与安全界定为反向关系，隐含着弱国自主性提升造成同盟关系削弱和不追随行为等逻辑。但在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寻求自主性并不一定会对强国采取不追随行为，一些有关自主性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弱国在强国支持下拓展自身利益的追随行为。^[20]弱国的成本收益计算也会使其产生不追随行为。当弱国认为同盟边际效用下降，^[21]本国所获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存在落差时，^[22]会对强国释放出抵抗信号。^[23]

综上，现有研究虽对弱国不追随行为有一定解释力，但未集中关注此现象，对美国盟友的差异化不追随行为与多重态度转变也未作区分。其中，弱国可能对强国采取从消极回应、要挟加价、公然对抗到脱离同盟的多维度变化。同盟相互依赖是盟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弱

国对强国采取何种态度受到二者相互依赖的影响。一国依赖于盟友会使自身受到制约,而盟友的依赖则使一国获得支配权力。同盟建立最重要的目的是应对威胁以保证安全,威胁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强弱国是否存在共同安全利益,进而推动弱国对强国政策变化。因此,本文以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为核心因素,探讨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的产生机制。

三、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从相互依赖、威胁认知的角度解释弱国对强国的不追随行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依赖是主体被客体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24]斯奈德提出,同盟依赖是指盟友间因背弃伙伴关系,或未能提供对方期望的支持而对彼此造成的伤害。^[11]非对称性同盟中相互依赖同样遵循此两种定义,总体上表现为强弱国之间对彼此需要或受对方支配、影响的状态,具体呈现为当一方对另一方采取背弃或不支持行为时所造成的损失。本文使用的非对称性同盟相互依赖,虽建立在基欧汉与奈相互依赖概念基础上,但又有一定差异。同盟为保障和增进国家安全而建立,安全相互依赖不同于经济相互依赖:在战略排序优先性上,国家对安全相互依赖的重视程度高于经济相互依赖;在形成与建立过程中,安全相互依赖对参与方式、外交关系要求较高。安全相互依赖的建立需签订正式同盟协定以明确行为体安全承诺与义务。经济相互依赖在没有签订正式协议时同样可以维持。安全相互依赖是国家外交关系达到较高水平的结果,经济相互依赖即使在外交关系一般甚至较差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维持。以上决定了安全相互依赖的替代手段相较于经济相互依赖更难获取,具有较强稳定性。如果分析中加入经济依赖,要考虑的实际情况将更为复杂。经济依赖只有在安全依赖持续存在且发挥关键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对盟友行为产生有限影响,故本文更多关注军事同盟中的安全相互依赖。

安全相互依赖同样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特质,但边界不那么清晰。本文把安全上的敏感性依赖界定为,当盟友未提供安全支持时对一国造成的损失,某种程度上由自身军事能力与维护本国安全所需之间的差距决定。把一国寻求可替代的强大友邦,或其他增进安全的手段及其付出的代价,作为脆弱性依赖的标志。相互依赖的脆弱性比敏感性更重要。敏感性呈现的是一国政策调整前的状态,行为体可以通过改变国内外政策降低其付出的代价。^[24]高敏感性并不意味着该国处于弱势受制于盟友,低敏感性也不代表该国可脱离对盟友的依赖,敏感性模式无法衡量一国与盟友之间的权力倾斜状态。脆弱性则能体现出国家是同盟关系中的主导者还是受制者,对弱国不追随行为影响更强。强弱国发生利益冲突时,对盟友不存在脆弱性依赖的国家在采取不追随行为时可能更加无所顾忌。而且一国对盟友安全上的脆弱性依赖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该国的敏感性,^①因此本文只简化分析脆弱性依赖。

除名存实亡的同盟外,一个国家对同盟的依赖是其维持关系的核心动机。非对称性同盟

^① 增进一国安全的手段有限,要么通过增加军备、国防力量提升自助能力,要么寻求盟友支持,或者与对手缓和关系以消解危机。当一国对盟友存在脆弱性安全依赖,代表它寻求替代安全政策的代价较高,可能除了盟友提供安全支持外别无选择。当盟友不提供安全支持时,该国所要付出的安全代价较大,敏感性自然就高。

中强弱国存在不同的基本利益诉求,弱国结盟最重要的目的是增进安全,强国结盟更多为实现政治目标,^①例如,以同盟为工具改变弱国政策,与弱国结盟保证其处于本国势力范围内,避免被敌对阵营吸引等。本文设定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包括军事安全依赖与政治依赖。军事安全依赖是指一国在面对威胁或维持日常防御、保持地区军力平衡时对盟国军事支持的需求。^{[11][14]}具体取决于一国应对威胁的军事实力差距,盟友对敌人的威慑和防御能力,同盟协议规定的军事援助内容,盟友的军事投射程度,安全替代手段的可用性和成本等。一国军事能力与威胁应对、日常防御、保持地区平衡所需的能力差距越大,盟友为弥补能力不足的潜在贡献就越大,对盟友的依赖就越强。政治依赖既包括盟国发出政策或合作意向时,期望从彼此的外交支持中获得的利益,^[11]也包括一国国内权力更迭后盟友承认其政权合法性的价值。政治依赖由盟友在一国政治目标中所处角色,或位置的重要程度决定。盟友可能处于一国地缘竞争的核心位置,或是扮演达成某种协议与政治目标不可或缺的角色等。当一国为达成某事迫切需要盟友在短时间内给予支持时,对盟友的政治依赖将进一步加强。短期来看,强弱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会在具体事件、时间上发生变化,相互依赖的强弱程度可相互转化。强弱国短期相互依赖共存在四种类型,分别用序号在表1中展示。

表1 强弱国相互依赖类型

		弱国对强国	
强国对弱国		强依赖	弱依赖
强依赖	①强强	②强弱	
	③弱强	④弱弱	

注:①表示强弱国互相存在强依赖的情形;②表示强国对弱国存在强依赖、弱国对强国存在弱依赖的情形;③表示强国对弱国存在弱依赖、弱国对强国存在强依赖的情形;④表示强弱国互相存在弱依赖的情形。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种相互依赖关系中,当强国对弱国为弱依赖、弱国对强国为强依赖(③弱强)时,弱国采取不追随行为动机较弱,相较于其他三种情形出现概率较低,本文不对其着重分析。而当强弱国均为强依赖(①强强),强国对弱国为强依赖、弱国对强国为弱依赖(②强弱),强弱国同为弱依赖(④弱弱)时,不追随行为发生概率更高。

本文分析建立在两个假定基础上:

假定1:所有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

假定2:强弱国长期保持着强国对弱国的弱依赖,弱国对强国的强依赖。

(一)相互依赖与不追随行为的产生条件

根据假定2,强弱国长期保持着强国弱依赖与弱国强依赖的非对称状态,塑造了同盟内部

① 当然在实际情况中,弱国也会对强国存在达成政治目标的利益需求,需要强国提供政策支持。强国对弱国增进安全的利益需求可能表现为军事投射需求等。此处增进安全与达成政治目标的利益诉求与强弱国之间并不存在固定对应关系,每一方的利益诉求需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定。

原始平衡。但当一方依赖程度短期内发生变化时,维持强弱国等级地位的原有依赖状态也被打破,构成弱国不追随行为产生的基本条件。

在表1的四种情形中,(③)表示强国对弱国弱依赖,而弱国对强国强依赖的状态,强弱国的短期依赖状态与假定2吻合。弱国处于弱势状态,较难出现不追随行为,故本文不讨论情形③。

①②④三种情形可能造成强弱国长期稳定状态发生变化,但此三种情形对同盟原始非对称依赖的改变存在差异。①表示强弱国均为强依赖,④表示强弱国均为弱依赖的状态,两种情形缩小了强弱国相互依赖差距。②表示强国对弱国为强依赖,弱国对强国为弱依赖的情形,颠覆了原本的同盟相互依赖关系。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是权力的来源,长期稳定状态中弱国对强国的强依赖决定它被后者支配和影响。而在②(强弱)情形中,此状态随着弱国依赖程度下降或强国依赖程度上升,得到短期扭转。强国支配弱国的权力减弱,弱国也因依赖关系变化获得一定主动权,进而产生不追随行为。具体而言:

在情形①(强强)中,弱国对强国有军事安全强依赖,强国也因战略调整,在具体事件中对弱国政治依赖增强,二者互为强依赖,权力差距缩小。此时,若强弱国存在利益分歧,弱国可能不惧怕强国惩罚,凭借着强国的强依赖采取不追随行为。强国对弱国的强依赖会让它在规训后者不追随行为时有所顾忌,令弱国在博弈中具备更多主动性。但弱国在此情形中仍然对强国有强依赖,为避免激怒强国将其不追随行为限制在较低程度,可能表现为对强国战略消极回应,增强对外政策自主性等。

在情形②(强弱)中,强国可能因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对弱国产生较强政治依赖,弱国对强国依赖较弱或变化不大,二者地位发生转换,弱国可能成为影响强国的关键角色。当弱国对现存安排不满时,可能趁机利用强国依赖以实现或扩大本国利益,对强国采取要挟加价等不追随行为。强国的战略变化与利益诉求较为明显,^[11]强国对自身依赖的增强会被弱国较快识别,并做出反应。强国对弱国依赖越强,后者主动权越多,越可能提出条件。基于弱国对自身的重要性,强国倾向于在可接受的程度上满足其要求。

当情形④(弱弱)发生时,强弱国相互依赖均明显减弱。此场景多出现于同盟双方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实行不同战略调整的情况。弱国可能因安全环境改善减少对强国军事安全依赖,强国则因战略收缩对弱国政治依赖下降。若双方出现利益分歧,强国不愿忍受弱国开出的高额价码。弱国不害怕被强国“抛弃”,也不愿付出一定代价寻求庇护,在与强国互动中可能采取较为明显的对抗行为,甚至结束盟约。

(二)威胁认知差异与弱国不追随行为的产生

应对威胁是同盟建立、存续的核心驱动力,威胁认知则决定强弱国是否存在一致外部威胁与共同利益。强弱国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组合将影响弱国不追随行为产生方式。

沃尔特以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与意图界定威胁,由此可确定一国威胁的主要来源、强度,^①进而决定强弱国如何应对威胁与协调利益。威胁认知相同指强弱国对同一威胁

① 此处据沃尔特对威胁的定义延伸可知,当A国面对综合实力、进攻实力较强,与该国地缘邻近且具有强烈进攻性意图的B国时,B国自然是A国威胁的主要来源,B对A的威胁较为强大且紧迫。

来源及其强度认知一致的情况，在本文中特指二者均认为同一威胁来源较强的状态。^①当强弱国认为没有威胁、存在不同威胁来源，或对同一威胁来源的强度认知不同时则为威胁认知差异。

威胁认知相同或差异与相互依赖三种情形分别组合后会产生六种结果，其中威胁认知相同与①(强强)②(强弱)④(弱弱)情形分别组合后通常会让弱国采取追随行为。当面对强大的同一外部威胁时，强弱国安全利益将高度趋同，会摒弃矛盾重新团结。即使在②④两种情形中，弱国对强国为弱依赖，但强国会成为弱国应对威胁的关键助力，弱国没必要在生死存亡时刻因其他分歧与强国对抗。

当强弱国威胁认知存在明显差异时，①②④情形中的强弱国缺乏弥合分歧的强大外部敌人，或认为同一敌人威胁强度不同，使得双方关键利益兼容度不足。弱国不想因追随强国而损害本国利益，不追随行为由此产生。特别是当弱国将外部行为视作伙伴，而强国将其视作威胁者或挑战者时，弱国可能不会支持强国。如前所述，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形成了短期不追随行为产生机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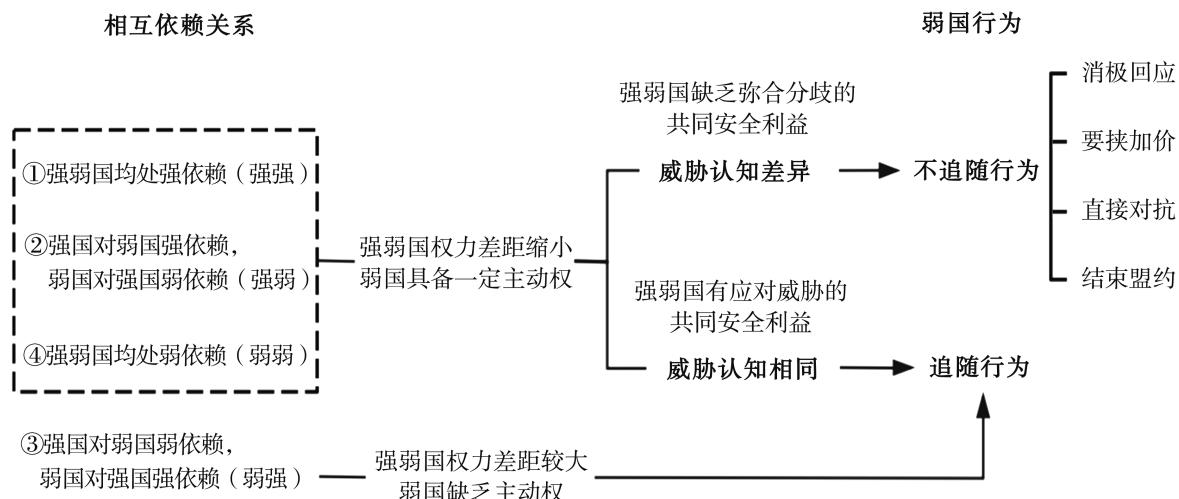


图1 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短期不追随行为产生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①②④相互依赖情形下，强弱国存在威胁认知差异，可能导致消极回应、要挟加价、直接对抗和结束盟约等四种程度各异的不追随行为。在①(强强)和②(强弱)相互依赖情形下，双方没有结束同盟的主观意图，都以维持同盟为政策基础。对弱国而言，可能在同盟稳定的前提下对于非重要议题采取消极回应、要挟加价等行为。而在④(弱弱)相互依赖情形下，弱国可能直接与强国对抗；当双方威胁认知差异难以弥合时，弱国可能会选择结束盟约。表2展示了三种相互依赖情形下可能产生的四种不追随行为。

^① 如果强弱国均认为同一威胁来源对自身的威胁强度较弱，在本文设定中就近似于强弱国没有威胁或不存在共同威胁，也是威胁认知差异的一种，这种强弱国对外部威胁均弱的认知情况被划归在威胁认知差异中。

表2 不追随行为类型

不追随行为	具体标准	对应案例
消极回应	强国向弱国发出要求其追随的明确信号。弱国为避免本国利益受损,未对强国资政表示明确支持或反对,在外交话语和政策行动中对强国资政表示疏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64年,英国在美国要求为南越提供军事援助时仅提供政治支持。 ● 2015年,泰国未答应美国开放基地的请求,但允许美国在泰国监视下有限使用领空。 ● 2017~2018年,韩国文在寅政府对美“印太战略”模糊表态。
要挟加价	当强国资需要弱国资配以达成政治目标时,弱国资自恃拥有强国资的政治依赖,通过坐地起价、威胁退出同盟等方式要挟强国资,直到强国资满足本国开出的价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59年,法国为获得军事控制权和建立英法美三边理事会而向美国要价,要挟退出同盟,最终从北约撤出地中海舰队。 ● 2022~2024年土耳其要挟美国,就芬、瑞入盟问题坐地起价。
直接对抗	当弱国资认为强国资政有损自身重要利益时,弱国资对其表示强烈反对,在多次协商后仍拒绝配合。弱国资虽态度强硬却不想脱离同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91~1992年,菲律宾否决基地协议令美撤军。 ● 2003年,法德拒绝参加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 ● 2014年,土耳其不顾美国反对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
结束盟约	强国资出现利益分歧,弱国资拒绝向强国资妥协,在强国资警告后仍坚定立场甚至升级对抗措施。弱国资存在替代盟友或强大友邦,拥有较强退盟动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86年,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表中的“要挟加价”与一般的讨价还价存在区别,讨价还价在盟友间达成妥协的过程中较为常见,要挟加价也属于一种讨价还价行为。但此处重点强调这种讨价还价的主动权在弱国资手中,强国资通常会尽量满足弱国资提出的要求。弱国资的要挟加价一般对同盟整体利益或强国资政具有重要影响,但惯常的讨价还价行为可能只涉及谈判双方彼此的利益。

在同样情形下,相互依赖脆弱性会影响弱国资不追随行为。比如,情形④强国资均为弱国资依赖,当弱国资对强国资存在明显的脆弱性依赖时,弱国资即便不追随强国资,也尽可能避免采取结束盟约等极端行为。因为弱国资除了该强国资外没有提供安全支持的替代盟友或友邦。当弱国资对强国资为非脆弱性依赖时,表明该国资可能拥有应对威胁的自助能力,或存在替代盟友及友邦,此时弱国资可能有结束盟约的明显意图。

四、案例分析

(一)韩国文在寅政府对美国“印太战略”模糊表态:双边强依赖下的消极回应

1953年10月,韩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标志着韩美同盟正式形成。韩美同盟是典型的非对称性同盟,韩国在国际关系中多以美国为中心制定其外交政策。由于韩国军事能力不足以应对外部威胁,使其对美存在长期强依赖。美在韩军事部署是其在亚太地区维持军事存在

的重要支点,决定其对韩也具有较强军事安全依赖。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和韩国实力提升,美国对韩国在协助遏制中国方面的政治依赖明显加大。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越南岘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正式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25]“印太战略”出台。同一时期,他在访韩时对韩国参与“印太战略”发出积极信号。特朗普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韩美同盟对朝鲜半岛和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26]韩美联合新闻稿中写道,“特朗普总统强调,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自由、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韩美同盟仍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关键”。^[27]这表明美国“印太战略”需要韩国支持,对韩国存在较强政治依赖。韩美互为强依赖(情形①),缩小了两国相互依赖差距,构成韩国对“印太战略”采取消极回应等不追随行为的基础条件。

文在寅与特朗普会晤后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印太战略”,而是采取模糊策略。韩美互为强依赖下韩国不追随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文在寅政府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认知与美国存在明显差异。在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朝分别被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与“流氓国家”,是美国的主要挑战者之一和“竞争对手”(Rivals)。该报告故意歪曲“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与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影响范围,重新安排对其有利的地区秩序”,“朝鲜破坏地区稳定,威胁美国及其盟友”。^[28]而文在寅时期,韩国对朝鲜的敌对态度总体下降,不再刻意将其塑造为敌人。2018年韩国《国防白皮书》甚至删除了对朝鲜“敌人”的称谓。韩国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需要修复因萨德部署而恶化的双边关系,文在寅政府在2017年就萨德问题作出“三不一限”^[29]表态。韩国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外交协调需求,承认中国在推动朝鲜半岛形势缓和与半岛问题解决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30]韩国自然不愿跟随美国与中朝对抗。

2022年5月,韩国出现政权交替,与文在寅持有不同威胁认知的尹锡悦政府上台。尹锡悦政府对中朝的认知与美接近,2022年版《国防白皮书》时隔六年后再度将朝鲜称为“敌人”。^[31]韩美相互依赖未发生明显变化,威胁认知趋于一致,彼此利益重合度较高。俄乌冲突加剧了韩国对安全环境的担忧,促使其积极配合美“印太战略”,韩美同盟得到空前强化。

(二)土耳其借北约扩员问题对美加价:强弱依赖下的要挟加价

1952年2月土耳其加入北约,正式与美国确立同盟关系,土美为非对称性同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与瑞典放弃中立,向北约提出入盟申请。美国全力支持两国加入,美国总统拜登于2022年8月签署两国入盟议定书。加入北约需得到成员国一致同意,当多数国家表示支持时,土耳其却坐地起价,要求芬、瑞两国放弃支持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引渡制造政变的“居伦运动”人士。^①表面来看,土耳其以芬、瑞支持恐怖主义为由阻止两国加入,但也是借此机会向主导北约的美国趁机要价。

^① 该组织由伊斯兰传教士费特胡拉·居伦(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领导,被土耳其指控为2016年末遂政变的策划组织。土耳其将“居伦运动”称为“费特胡拉恐怖组织”。

土耳其在入盟问题的推拒过程中,主要对美表现出两点诉求:一是重启军售。2019年土耳其因不顾美国反对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而被美制裁,被排除在F-35战斗机项目之外。2021年10月土耳其再度向美提出购买F-16战斗机,却遭到美国国会反对。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土耳其、芬兰、瑞典签署三边备忘录,芬、瑞尽力满足土耳其反恐要求以换取入盟机会。2023年3月,芬兰因满足土耳其安全关切而率先获得其批准,瑞典却因未落实三边备忘录而遭到土方反对。在后续谈判中,土耳其以批准瑞典入盟为筹码要求美国同意出售F-16战斗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他们说这(指美对土出售F-16战斗机)需要国会批准,如果他们有国会,我们有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指土议会决定瑞典是否入盟)”。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将动用一切资源解决土耳其战机购买问题。^[32]2024年1月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拜登政府随后正式通知美国会拟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33]二是协调反恐。在芬瑞入盟谈判中,土耳其反复要求美国及其他北约盟友加强反恐合作,共同打击“费特胡拉恐怖组织”(Fetullah Terrorist Organization, FETO,即“居伦运动”)、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居伦运动”头目及参与者一直在美国境内受到庇护,土耳其多次向美国提出引渡请求却碍于其复杂的司法程序未获进展。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Syrian Kurdish People's Defense Units, YPG)被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但YPG自2015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伙伴。美土在反恐立场上存在较大分歧。土耳其借助芬、瑞入盟重申反恐合作诉求,美国虽未完全满足其要求,但总体采取了缓和举措。例如,2022年9月埃尔多安就曾表示,美国正在筹备将“费特胡拉恐怖组织”头目及其成员移交给土耳其司法部门。^[34]2023年7月在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美国作为成员国也配合土耳其在北约内部设立“反恐特别协调员”(Special Counter-Terrorism Coordinator),启动修订反恐指导原则工作等。^[35]

土耳其与美国相互依赖的瞬时变化为其不追随行为产生提供基础条件。由于俄乌冲突爆发,美国对土耳其产生了较强政治依赖(情形②),主要体现在:一是时间紧迫性上,美国希望土耳其尽快同意芬兰、瑞典入盟,避免谈判久议不决,缓解两国安全压力;二是战略关键性上,土耳其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位于北约东南翼、扼守黑海,地缘战略重要性与角色特殊性决定它对美国的关键价值。^[36]美国不能因土耳其反对而与其决裂;三是达成事件的必要性上,芬、瑞入盟,土耳其这一票不可或缺。以上因素使美国对土耳其产生较强依赖,使后者占据更多主动权,芬兰、瑞典与美国致力于加强协调以满足土方需求。

当长期相互依赖状态被暂时颠覆时,双方威胁认知差异促使土耳其采取不追随行为。美国认为俄罗斯是国家安全威胁者和国际秩序破坏者。而土耳其认为俄罗斯既是威胁者又是合作者。土俄之间虽在黑海、中东以及北非等地缘政治问题上存在竞争,但土耳其需要利用俄罗斯缓解西方压力,扩大外交空间。土耳其无意配合美国与俄罗斯为敌,却可利用美国较强依赖实现本国政治目标,对美国的要挟加价行为就此产生。

(三)菲律宾否决基地协议令美撤军:双边弱依赖下的直接对抗

1951年8月,菲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确立同盟关系。冷战期间,菲律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菲律宾在对外政策中紧紧追随美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调整与菲律宾安全环境改善使两国相互依赖均减弱(情形④),由军事基地引发的分歧逐渐暴露。1991年9月菲律宾参

议院否决了《菲美军事基地协议》，1992年美国从苏比克海军基地撤军。1994年菲律宾高等法院拒绝将《军事地位协定》延期，双方联合军演暂停，美军在菲律宾不再享有特殊地位。^[37]美国五角大楼在1992年发布的《东亚战略倡议》与1995年发布的《东亚战略评估》中，将菲美安全关系置于美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范畴中。^[38]菲美同盟关系降级，陷入“漂流”状态。但菲美双方并未向对方提出任何中止协议的请求，双方依然是盟友。

20世纪90年代初，菲美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均发生变化。当外部最大威胁苏联解体后，美国不需要在东南亚维持较多军力，菲律宾军事战略重要性被削弱。在1990年5月的基地谈判中，美国表示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防御能力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希望将东南亚的军事部署从在菲单一大规模存在转向广泛分布。^[39]美国开始担忧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与毒品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于菲律宾而言，菲美同盟建立时，菲律宾依赖美国抵御共产主义与日本侵略，但随着苏联解体与菲日关系良好发展，菲律宾认为短期内不会面临外部入侵，菲美构成双边弱依赖。菲美失去共同威胁，让双方在基地问题上分歧凸显，菲律宾做出否决基地协议令美撤军的直接对抗行为。

“漂流”同盟会在共同威胁出现后恢复密切关系。1995年和1998年菲律宾两次挑起“美济礁事件”，中国坚决反制令其图谋失败。菲律宾在此过程中寻求强化菲美同盟，试图以共同防御条约推动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美国虽未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支持菲律宾，但强调需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维护航行自由，^[40]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有意与菲律宾重新加强军事合作。双方持续开展军舰访问、军事训练、联合演习等，^[41]1998年菲美签订《访问部队协定》，美国重返菲律宾。菲美威胁认知趋于一致，相互依赖增强，再度紧密配合。

(四)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双边弱依赖下的结束盟约

1951年9月，新西兰与美国、澳大利亚签署三边同盟条约，澳新美同盟正式建立。新西兰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重要盟友，曾坚定支持美国冷战策略。但随着美苏核武竞赛白热化，新西兰在核恐怖平衡的笼罩下，催生了反核意识。1984年7月工党上台后积极推行反核政策，明确禁止载有核武器和核动力的船只进入新西兰港口。1985年1月美国向新西兰提出常规动力军舰“布坎南号”访问请求，但坚持对涉核问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42]的原则。这与新西兰确认无核船只的要求相矛盾，新方最终拒绝美方访问。美国认为新西兰此举是对整个西方联盟的挑战，威胁要暂停对新防卫义务，^[43]但新并未让步，准备将无核地位法律化。1986年6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与新西兰总理兰格(David Lange)在出席东盟部长级会议之际举行会晤。美方称两国作为朋友分开了，新西兰拒绝美国海军舰艇停靠的做法背离了澳新美同盟的本质，故美方中止对新西兰的安全义务。^[44]1986年8月，新西兰缺席同盟理事会会议，美澳只得自行召开，^[45]新西兰此举实质上表明其退出澳新美同盟。^[46]

新美两国同盟破裂是非脆弱性弱弱相互依赖(情形④)条件下双方威胁认知差异造成的。于新西兰而言，澳新美同盟最初建立始于新西兰对日本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担忧，但新日关系逐渐改善，经贸迅速发展，甚至开展有限防务合作。^[47]加之新西兰有利的地理环境，与英澳的亲密关系，使其对美呈现非脆弱性弱依赖。美国方面，美澳之间额外签订了关于防御设施部署的双边协议，表明澳新美同盟中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明显高于新西兰。对美国而言，即

使新西兰退出三边同盟，损失也不大。^[46]

在威胁认知方面，核战争被当时的新西兰认为是主要国家安全威胁，美苏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核武军备竞赛让新西兰高度担心核战争发生。从1946年至1982年，太平洋地区有150多个核装置爆炸。^[41]大国在太平洋地区频繁的核试验也强化了新西兰对核威胁的认知。而美国认为最大威胁是苏联，^[43]将核武器系统部署作为同盟关系是否合格的判断标准。^[41]双边非脆弱性弱依赖下新美威胁认知差异无法弥合，新西兰选择了结束盟约的极端不追随行为。

菲律宾与新西兰的案例都属于情形④弱弱相互依赖，为何菲律宾没有与美国结束同盟关系，而新西兰却选择退出同盟？关键在于相互依赖脆弱性和威胁认知差异程度不同。对菲律宾而言，菲美同盟持续多年，美国既是安全保障者又是重要域外大国，可维持东南亚力量平衡。新西兰认为本国不存在除核战争以外的重大外部威胁，且与英澳存在天然联系。新澳对彼此安全作出过公开承诺，新英则有五国防务安排。新西兰军事力量与英澳合作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自身安全与地区稳定所需。菲律宾对美依赖存在脆弱性，使其无法轻易脱离同盟；而新西兰存在替代选择，对美国为非脆弱性依赖。威胁认知方面，菲律宾未将美国视为威胁。新西兰则认为核威胁最大，美国是核威胁缔造者和始作俑者，可被视为间接威胁，因此新西兰有较强的脱盟意图。

五、结论

非对称性同盟结构决定了强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平等地位，形成弱国对强国强依赖、强国对弱国弱依赖的长期稳定态势，使弱国在对外关系中倾向于追随强国。但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有时明知会招致强国惩罚，依然采取不追随行为，为此需要更多关注同盟发展中弱国行动逻辑。本文以韩国、土耳其、菲律宾、新西兰对美国的不追随事件为例，探讨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不追随行为产生机制。

本文认为，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是弱国产生差异化不追随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尽管强弱国之间有稳定的长期相互依赖关系，但在短期、具体事件和议题上，强弱国相互依赖差距会缩小，甚至逆转。当强弱国出现利益分歧，且短期内呈现强强相互依赖，弱弱相互依赖，强国对弱国强依赖而弱国对强国弱依赖等三种情形时，弱国可能采取不追随行为。此三种情形下，弱国获得更多主动权，具备产生不追随行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同盟以应对威胁为首要目的。威胁认知是强弱国对威胁来源及其强度的感知，影响双方安全利益兼容度与同盟政策走向。当强弱国存在威胁认知差异时，利益分歧与内部矛盾较为突出。此时在强强相互依赖中，弱国可能采取消极回应等低强度不追随行为；在强弱相互依赖中，弱国可能利用强国短时强依赖“狮子大开口”要挟加价；在弱弱相互依赖中，弱国与强国直接对抗或与其结束盟约。而强弱国威胁认知一致时，双方存在应对外部威胁的共同安全利益，即便弱国因上述相互依赖情形获得一定主动权，也不会轻易对强国采取不追随行为。

本文所述案例呈现了非对称性同盟中弱国以小博大，在对外事务中疏远、影响、反对强国，致使同盟“漂流”甚至终结的多种情形。对弱国不追随行为的细化探讨表明，国际关系中弱国并非对强国逆来顺受，而是具有一定主动性与外交智慧的丰富主体。强国是弱国不追随

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强国如何应对弱国不追随行为对同盟维持与管理至关重要,这也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 Jason W. Davidson. America's Allies and War: Kosovo, Afghanistan, and Iraq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32–35, pp.147–157.
- [2] Tuomas Forsberg. 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ar on Iraq: Anti-Americanism, Pacifism or Emancipation? [J]. Security Dialogue, Vol.36, No.2, 2005, p.223.
- [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26.
- [4] 斯蒂芬·沃尔特. 联盟的起源 [M]. 周丕启,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7,22.
- [5]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
- [6] 凌胜利. 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 [J]. 社会科学, 2018 (10): 16–25; Geoffrey P. R. Wallace. Alliance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Determinants of Military Strategy [J].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5, No.3, 2008, pp.224–243.
- [7]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 4, 2000, pp.705–735.
- [8] Jaewook Chung. Capability Change,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Alliance Termination [J].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4, No.2, 2016, pp.209–240.
- [9] Dohee Kim. Case Analysis of the R.O.K.–U.S. Alliance Burden-Sharing through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Evolution of an Asymmetric Alliance [J]. Korea Observer, Vol.51, No.1, 2020, pp.27–52.
- [10] 董向荣. 韩国起飞的外部动力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05–217.
- [11]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J].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466–467, 473;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3–186, p.31.
- [12] 苏若林,唐世平. 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 [J]. 当代亚太, 2012(3): 5–38.
- [13] Alena Vysotskaya Guedes Vieira. The Politico-Military Alliance of Russia and Belarus: Re-Examining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EU in Light of the Intra-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J]. Europe-Asia Studies, Vol.66, No.4, 2014, pp.557–577.
- [14] Patricia A. Weitsman. Alliance Cohesion and Coalition Warfare: The Central Powers and Triple Entente [J].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3, 2003, pp.79–113; 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 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J]. 当代亚太, 2021(4): 28–66.
- [15]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J]. Survival, Vol.39, No.1, 1997, p.159.
- [16] Iain D. Henr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in Asia, 1949–1969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32–38; Mark J. C. Crescenzi and Jacob D. Kathman.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2, 2012, pp.259–274.
- [17] 周建仁. 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 [J]. 国际政治科学, 2020(2): 1–50; 尹继武. 联盟信任的生成机制 [J]. 国际政治科学, 2008(4): 35–78.

- [18] Jasen J. Castillo and Alexander B. Downes. Loyalty , Hedging , or Exit : How Weaker Alliance Partners Respond to the Rise of New Threats [J] .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 Vol.46 , No.2 , 2020 , pp.1–43.
- [19]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J]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35 , No.4 , 1991 , pp.904–933 , p.912.
- [20] 孙洪波. 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 [J] . 拉丁美洲研究 , 2020(4) : 49–72.
- [21]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 A Theory and Test [J] .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 Vol.37 , No.4 , 1984 , pp.523–544.
- [22] 钟振明,关梦瑞.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J] . 东南亚研究 , 2021(6) : 112–131.
- [23] 王雄发,谢凌志. 不对称联盟管理的弱国议价机制——以美国联盟体系为例 [J]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22(8) : 130–153.
- [24]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M] .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2 : 9 , 12–17.
- [25] Trump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EB/OL] .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 2017–11–10.
- [26] Trump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Mo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EB/OL] .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ident-moon-republic-korea-joint-press-conference-seoul-republic-korea/> , 2017–11–07.
- [27] Trump White House. Joint Press Release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EB/OL] .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press-release-united-states-america-republic-korea/> , 2017–11–08.
- [28] Trump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2017–12–18.
- [29] 韩国外交部:韩中沟通结果反映双方立场和关切 [EB/OL] .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1031004900881?section=search> , 2017–10–31 ; 한중 관계 개선 관련 양국 간 협의 결과 [EB/OL] . https://www.mofa.go.kr/www/brd/m_4080/view.do?seq=367200 , 2017–10–31.
- [30]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EB/OL] .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xgxw_676530/201811/t20181117_7980199.shtml , 2018–11–17.
- [31] Min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2022 Defense White Paper [EB/OL] . https://www.mnd.go.kr/user/mndEN/upload/pblictn/PBLICTNEBOOK_202307280406019810.pdf , 2023–02–16.
- [32]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Türkiye Has Always Supported NATO's Open Door Policy [EB/OL] .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47660/-turkiye-has-always-supported-nato-s-open-door-policy-> , 2023–07–10.
- [33] U. S. Congress. Turkey : Major Issues and U. S. Relations [EB/OL] .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4000> , 2024–09–26.
- [34]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There is No Problem between Türkiye and the U.S. That They as Two Strategic Partners Cannot Resolve [EB/OL] . <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39678/-there-is-no-problem-between-turkiye-and-the-u-s-that-they-as-two-strategic-partners-cannot-resolve-> , 2022–09–19.

- [35]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Attacking People'S Sacred Values is Not Freedom of Thought ; It is Barbarism [EB/OL].<https://www.tccb.gov.tr/en/news/542/147747/-attacking-people-s-sacred-values-is-not-freedom-of-thought-it-is-barbarism-> , 2023-07-12.
- [3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grated Country Strategy : Turkey [EB/OL].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7/ICS_EUR_Turkey_Public.pdf , 2022-05-13.
- [37] 刘琳 . 美菲防务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前景 [J]. 当代美国评论 , 2017(1) : 57-68.
- [38] Renato Cruz De Castro. Special Relations and Alliance Politics in Philippine-U.S. Security Relations , 1990-2002 [J]. Asian Perspective , Vol.27 , No.1 , 2003 , p.158 , 143.
- [39] 周琪 .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4(6) : 27.
- [40] 李金明 . 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 [J]. 南洋问题研究 , 2000(1) : 71.
- [41] Michael C. Pugh. The ANZUS Crisis , Nuclear Visiting and Deterrence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p.64 , pp.134-135 , p.13 , p.14.
- [42] Amy L. Catalinac. Why New Zealand Took Itself out of ANZUS : Observing "Opposition for Autonomy" in Asymmetric Alliances [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 Vol.6 , No.4 , 2010 , p.318.
- [43] U.S. Department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86 [G].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87 , p.490 , pp.493-495 , p.28.
- [44]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Australia ,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ZUS) [EB/OL].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usmu002.asp#3 , 1951-09-01 ;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 Defence and security [EB/OL].<https://www.mfat.govt.nz/en/countries-and-regions/australia-and-pacific/australia/> , 2024-03-08.
- [45] 汪诗明 . 《澳新美同盟条约》对新西兰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影响——基于冷战时代的考量 [J]. 史学集刊 , 2011(5) : 17-23.
- [46] Stuart McMillan. Neither Confirm nor Deny , the Nuclear Ships Dispute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 Praeger Publishers , 1987 , p.48 , 116.

〔责任编辑 孟祥臣〕

countermeasures to hedge against U.S. investment containment with institutional power.

Key Words: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Dual-Track Mechanism; Investment Review; Technology Containment;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China-U.S. Relations

Non-Following Behaviors of Weak States in Asymmetric Alliances

WANG Jing DONG Xiang-rong · 64 ·

Abstract : Allianc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Given the substantial power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U.S. and its partners, generally speaking, alliances led by the U.S. can be defined as asymmetric alliances. In such alliances, the weaker parties are usually in an unequal position, tending to follow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of the strong states in their foreign policy. However, weak states sometimes exhibit varying degrees of non-following behavior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weak states' non-following behaviors with interdependence and threat perception as core elements, and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hort-term interdependence dynamics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states: strong-strong, strong-weak, weak-strong, and weak-weak, and that the states hold consistent or different threat perceptions. When the strong states' dependence on the weak ones is low while the weak states' dependence on the strong ones is high, the power gap between them is large, and the weak states do not have the initiative. When the strong and weak states have the same threat perception, both sides have common security interests in addressing threat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weak states generally do not exhibit non-following behaviors. In contrast, under the other three interdependence scenarios, particularly when coupled with divergent threat perceptions, the power gap between the strong and weak states is narrowed, and the weak states have a certain initiative. The absence of a common threat to bridge interest disparities creates conditions where the weaker states may resort to non-following behaviors. Such behaviors can be manifested as negative response, threatening and raising prices, direct confrontation, or even ending the alli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non-following behaviors of South Korea, Türkiye, the Philippines, New Zea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rtain specific events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non-following behaviors of weak states in asymmetric alliances.

Key Words: Interdependence; Threat Perception; Asymmetric Alliance; Non-Following Behaviors;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 (ANZUS)

The foundation of Technological Hegemony : A Study on the Agenda-Setting by U.S. Digital Companies

HUANG Ri-han BAI Rui-shan · 79 ·

Abstract : U.S. digital companies have long relied on technological hegemony to shape global Hot-topic technology issues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agenda-setting power, thereby reinforcing their international dominance. This hegemony stems from these companies' control over the global internet industry, including monopoli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ich creates asymmetric dependencies through network media dominance that can challenge state sovereignty and amplify their agenda-setting capacity. During the nascent and hype phas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se companies employ cognitive and normative agenda-setting strategies to direct global attention to topics such as blockchain, the metaverse,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perating across th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cognition, persuas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e successful shaping of Hot-topic technology should align with major powers'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 execu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bility. Temporally, blockchain and generative AI have sustained prominence owing to recognition by major powers, whereas the metaverse proved comparatively short-lived. The transient nature of such technological hype reveals the limits of agenda-setting: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maturity and inadequate infrastructural support accelerate topic turnover. Notably,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DeepSeek challenges U.S. agenda-setting capacity and signals a new phase in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U.S. Digital Companies; Technological Hegemony; Agenda-Setting Capacity; Hot-topic technology Issues;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GENG Zhao · 95 ·

Abstract :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elevat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an issue of global concern and a focal point in U.S.-China competition. This standardization involves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values and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aking it a complex issue in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U.S. has constructed a series of negative narratives targeting China, attempting to curb China's deep involvement in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and develop anti-China standard systems by establishing various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e U.S. has also made market access and compliance a key issue in securitization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trade measures against China. The U.S. digital companies have also engaged in numerous disputes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over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These actions ar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of its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The primary driving factor for the U.S. to launch a digital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is its desire to diversify competitive tools, reinforce U.S. dominance in global digital technology standards, reshape the global digital trade and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enhance U.S.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satisfy its security perceptions. These competitive measures risk fragmenting the global digital technology standards governance system and exacerbat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rade system.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system for digital space will likely encounter new challenges.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China-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Japan and South Korea's Supply Chain Pan-Securitization under "Trump Shock": Dilemmas and China-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JIN Xiang-dan · 110 ·

Abstract : Amidst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initiated a "securitization" shift in their supply chains. They have been restructuring supply chains that were previously overly dependent on China,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U.S.-led supply chain alliances to enhance economic secur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leveraging U.S.-China competition to consolidate their technological and manufacturing advantages at key nod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Washington has pursued the building of a U.S.-centric, domestically anchored, and "De-Sinicized" supply chain network, with tariffs serving as a key policy instrument to advance supply chain "Americanization." This strategy directly challenges the supply chain "securitization" strategies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context of Trump 2.0, bo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face a dual dilemma: the reality of being unable to rapidly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and simultaneously grappling with the uncertainties and cost pressures resulting from deepened reliance on the U.S. and fragmented supply chains. Their positions as "node" countri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make it difficult for any "choose-a-side" strategy to balance security and competitiveness. China, serving as the central hub of the global supply network, remains indispensable to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Japanese and Korean supply chains. Enhanced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can effectively align the advantages of the "hub" with those of the "node" economi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collective supply chain security and mitigating the risks posed by rising protectionism.

Key Words: Trump 2.0; U.S.-China Competition; Supply Chains; Securitization; China-Japan-South Korea Cooperation